

政德镜鉴

他是一个半生戎马、胸怀坦荡的直性人。在苍茫广袤的边地，他对调解民族矛盾、维护边地和平，得心应手、熟谙于心；

但在暗流汹涌的朝廷，他却时常因率直而触怒帝王，得罪言官。

萧大亨：朝廷倚为守边“干城”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夕阳缓缓垂落，牧歌渐渐响起，明神宗时代的北边重镇，沐浴在宁静安逸的和平气氛中。得益于马市的开放，两族百姓放下了仇视的武器，作起了互利的贸易。而祥和宁静的背后，幸赖一位边疆守护者的苦心经营。他就是晚明守边重臣，曾任刑部、兵部尚书的泰安人萧大亨。

萧大亨是通达权变的边疆能臣。对北疆蒙古，他力主开市安抚，又不忘加强战备，北方虽有警情而无烽烟。对日本侵略，他力主抵抗，筹划军旅，终于海疆靖清。

少年孤苦，初仕解民倒悬

十五岁以前，萧大亨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可就在这一年，曾将家庭由济宁府迁往泰安府的慈父病故了。失去父亲，往往意味着贫寒与挣扎。青春年少的萧大亨，早早地体验到生活的不幸与艰难。好在他境遇虽寒微，却胸怀远志、喜学不倦，每以家乡溪流山谷里质地坚硬的山石自况。同乡友人曾作诗，称赞萧大亨“君往泰山下，日夕吟梁甫”。伴着泰山日出日落的瑰丽奇景，萧大亨躬于垄亩，“好为梁甫吟”，耕读两相娱。

泰山麓下的青石小径，记录着萧大亨风雨无阻的求学路。青苔间留下的脚步痕迹，磨蚀着他的毅力，积蓄着他的才华。嘉靖四十年（公元1561年），29岁的萧大亨考取山东乡试举人。当年的乡试主考官是朝廷派往山东的学政吴维岳。吴氏颇有识才的眼光，他出任会试同考官时，曾慧眼识珠拔取了江陵人张居正。督学山东期间，吴维岳“拔于谷峰（慎行）于垂髫中，其他萧岳峰（大亨）太保而下，凡东省显人，俱经奖拔”。

16岁的天才少年于慎行，在本次秋闱中结识了萧大亨。两人虽相差13岁，却并未影响彼此的真挚友情。此后数十年间，两人风雨同舟、甘苦与共，可谓订交最年少而交契最长久。到了万历三十五年，时任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病故。闻听故友溘零，75岁的萧大亨不顾自己年迈体弱，执意数次亲往送别，悲痛之情发于肺腑。

中举次年初春，清寒尚且料峭，由泰安至京师的驿道上，车辘卷起的烟尘已随风阵阵浮起。一辆辆疾行的车马穿行而过，留下赶考举子们行色匆匆的背影。踌躇满志的萧大亨，也沿着驿道北上，参与该科春闱。很快，各地俊杰精英汇聚京师，他们摩拳擦掌、暗暗较劲，准备一比才学高低。

这一科的殿试金榜，人才济济，是冠绝一时的“龙虎榜”。其登进士者后来多有名臣，其中最杰出的七人有“七玉”的美名。而如申时行、王锡爵更先后成为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。

萧大亨殿位列三甲同进士，排名比较靠后，没有人选翰林院的资格。按照明朝惯例，名次靠后的进士要外放到他省任县令。萧大亨要赴任的那个地方，名叫榆次县。

榆次县在今山西省晋中市境内。明时，这里属于北方边塞，不仅自然条件恶劣，还常受蒙古骑兵的侵扰，烽火连连，民生维艰。萧大

亨上任时，榆次正值丧乱之后，“连岁遭荒，民多转死”。早年寄身底层的萧大亨，对百姓的情感深厚，如今亲见他们流离失所、埋骨沟壑，仿若痛在己身。上任之初，他就立下了让榆次脱离于水火决心。他张贴榜文，招抚奖励流民开垦荒地；又发仓放粮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，维持他们的生存所需。在萧大亨竭力经营下，榆次县逃亡的民众多半回乡复业，乡野闲田渐次垦荒。来年风调雨顺，粮食收成喜人，榆次县很快“四境立苏”。

萧大亨待“民有食粮”后，将当地赋税“编审革正之”。他详加勘查，尽力革除税赋征收中“征贫愈急，征富愈缓”的不公平现象。此项政策实施后，县民欢语道：“赋役称平，仅此一见。”他们欢欣非常，纳赋热情高涨。州府衙门见榆次县税赋征收有翻天覆地的改观，就令萧大亨于附近县邑推广此项改革，也大获成功。

榆次地处荒原、天地广袤，民风也如气候一般粗犷直率。因为没有礼仪引导向善，率真的性情变为凶悍好斗的民俗，私斗而致死者屡见不鲜。历任官员或放任纵容，导致形势愈演愈烈，或严刑峻法，却难消私斗之俗，因而皆称榆次为“难治”。萧大亨在稳定当地经济局势后，极力倡导移风易俗，以文化人，希望从“人心”处着手改善。对百姓内部矛盾，萧大亨常走入其间，多方引导，百姓见县令如此敦厚，乃“回心易辙……刁风顿息”。公务闲暇时，萧大亨常至县学视察，督促生员求学上进，由是榆次“土风蒸蒸日上”。

当时的行吟诗人谢榛，见榆次的巨大变化，欣然赠诗于萧大亨，其中有“山县坐令风俗美”的真诚褒奖。万历年间编纂的《榆次县志》也记载：“（萧大亨）博大详明，凡所注磨，不求赫赫之声，而士民永藉其利。”

广袤边陲，大有可为。在榆次县任上，萧大亨尽情挥洒汗水、留下足迹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风貌。而热爱惜民之情，也深深刻入百姓心灵。嘉靖四十二年，萧大亨因政绩卓异擢升为户部主事。去任之时，百姓不忍相离，“老幼攀辕泣下”……每当萧大亨车马前行，当地百姓就吟咏歌唱，抒发思念，“缙绅有诗，衿裾有歌，庶民有谣”……后来萧大亨上任他职，路过榆次县，百姓闻讯，“童叟欢呼……若子再见父母，竟劝觞上寿”。到了万历十八年，榆次百姓为萧大亨立起去思碑，又“家绘一像祠奉之……愈久愈思，念念不忍释，乃谋建祠以祀之，不逾月而堂堦然告成”。

带着百姓的无限思念，萧大亨来到京师上任。但他在榆次任上挂心的一件“小事”，却让他仕途生涯由“治民”变为“抚边”，从循官良吏变为守边重臣。

榆次县地近边陲，直面蒙古的威胁，所以百姓对于城防状况忧心挂怀。乡民曾募资在县城南关建起土城，萧大亨见其“土筑而矮，不足捍暴御侮”，决定瓮以砖石，加固城防。但未及施行，他便因升官而暂时作罢。但萧大亨仍心怀此事，常常寄书当地，告诫此事。时隔多年后，当他出任宣大总督，复“移檄榆次”，令当地官员加固南关。城墙竣工后，百姓称誉“崇墉列雉，如草如翠，邑人倚为连城，实千百世之利”。



萧大亨墓地外景

这是萧大亨“御边”生涯的第一步。

力开马市，烽烟熄而边贸兴

萧大亨入京任职后，很快擢升为户部郎中，不久又外放边疆道台。后来的岁月里，诡谲多变的边疆，成了萧大亨展示守边才华的绝佳舞台。

明朝的北部边疆，百十年来一直遭受蒙古的军事威胁。为了防御他们南下袭扰，明廷修筑长城、增添戍卒、构建边塞，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。但长期的拉锯对抗，只能让双方付出愈难承受的代价。到明穆宗时，筋疲力竭的鞑靼希望可以同明朝开市贸易，通过和平手段获取生活物资。

鞑靼的“求和”意愿，吹皱了平静如一池春水的明代朝堂。朝臣们赞同者不少，反对者也很多，而且他们都有一套理论来支撑自己的主张。局面僵持不下之际，作为防御蒙古的前线疆臣，其意见就显得格外有分量。萧大亨当时任陕西按察金事，官职虽低微，却对总督王崇古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他谋划边事时显露的独到见解，令王崇古非常钦佩和器重。在关键时刻，萧大亨向王崇古力陈开市益处，最终促成王氏上疏，请求朝廷恩准。

经过两人持续努力，互市协议终于顺利达成。明朝此后于北部边疆陆续开设马市十余处，方便两族百姓贸易往来。

荒凉苦寒的边境，终于焕发了希望的生机。边界马市内，汉族民众开起了铁匠铺、绸缎铺、绒线铺和杂货铺。每逢开市的日子，赶市的各族民众摩肩接踵、熙熙攘攘，人群绵延有四五里之长。蒙古百姓带来了金银、牲口、马匹、兽皮和毡帽，汉族百姓带去布匹、丝绸、食盐、铁锅和农具。他们互通有无、各取所需，边界的肃杀气氛，化为喧闹谈笑。

马市开设后，蒙古不再依靠劫掠获取生活用品，边境压力大大舒缓。而明廷通过交易积蓄了大量优质军马，边地战斗力大为增强。

马市的优势展露无遗，故而萧大亨每任一处，都力促互市，维护安定。他在榆林、神木开设马市，以诚信为交易根本，因而“虏遂帖服……大得夷夏之和”。萧大亨的努力，让“互市贸易”欣欣向荣，渐渐打消了朝廷的疑虑。

边塞晏然，朝廷倚为“干城”

萧大亨深知，强大的军事实力，是保证和平的最终力量。所以他在互市贸易兴隆之际，依然不忘加强战备。他“广储备、缮甲兵”，修葺边堡十余所，由此鞑靼部众“奉约维谨”，“虏大畏渡河而牧……内外晏然”，收到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效果。

万历八年，萧大亨因军功被任命为宁夏巡抚，很快又调任宣府，成为独当一面的边疆重臣。宣府是京师屏障，又是马市咽喉，位置重要，作用关键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但在萧大亨上任之初，宣府局势却复杂而微妙。此前的抚臣为安抚蒙古，一味曲意逢迎，导致其渐渐骄横难制，和平局面脆弱不稳。萧大亨上任后，首先着力整顿宣府军务，改善防御局面。他对廉勇善战知晓边务的将校，都倾心接纳、委以重任，于是“人人乐为用，房中动静，（萧大亨）辄知之”。而对活跃在宣府的蒙古诸部，他在笼络人心之外，也恩威并施、间及雷霆。史书记载萧大亨面对蒙古诸部不轨行迹，往往严申旧约，裁抑其威，“精神折冲，颐指色授，俱有操纵”。萧大亨的守边策略收效明显，宣府局势迅速改观，“抚驭机宜，十不失一”。

万历十七年，萧大亨被任命为宣大总督，负责北疆的全面防御。萧大亨到任次年，蒙汉关系再度出现危机：鞑靼新君继位后，“顺逆不常”，侵扰边境。

在朝廷内部，对鞑靼究竟是和是战，争论非常激烈。有大臣指责中枢内閣过于软弱，内閣首辅申时行“朋奸误国”。他们力主对鞑靼宣战，要求皇帝责成萧大亨整军征讨。

关键时刻，内阁和皇帝都征询萧大亨的意见。他几经权衡，上疏郑重指出：“今国家御虏，当以抚顺剿逆为长策……（若）委边氓于锋镝，令军兴耗费无已时，非胜算也。”萧大亨反对轻率兴战、消耗国力，建议以安抚为

主，清剿为辅，维持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。他还致函阁臣申时行、王家屏等人，详细阐述自己的主张。萧大亨的建议，得到内阁大学士的支持，也受到万历帝的认同。当皇帝召见阁臣询问军务时，“申时行对如公（萧大亨）言”。

两年后，在萧大亨的“软硬兼施”下，鞑靼派使者赴明朝请罪，再度约定盟好誓言。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，在萧大亨的斡旋下消解无形。申时行在写给萧大亨的信中感慨道：“近时后生足不至边塞，耳不闻金鼓，而专言战斗之事，欲尽罢诸贡市，一意用兵，此可以葬葬举事耶？”他还称赞萧大亨“练达镇定得大体”，于边事见解卓越，超出同时人许多。

萧大亨镇守边疆多年，其间虽有烽烟，但始终没有大警。宣大边境呈现令人心醉的安定景象：草原上慑人心魄的战歌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悠扬婉转的牧歌。马市换来的铁锅，在蒙古包烹煮着鲜美的羊肉，散发着诱人的芳香。明朝的边塞耕地上，禾苗青青，马儿成行。刀光剑影、流民悲唱成为了过去的回忆。萧大亨的抚御之功，堪称奇伟，朝廷倚为边疆干城。

胸襟坦荡，救罪臣忤帝王

万历二十三年，镇边有功的萧大亨奉命还朝，出掌刑部事务。此时的明王朝在风平浪静下，隐藏着山雨欲来的潜流，诸弊丛生、隐忧重重。

半生戎马的萧大亨，在边地养成了直率敢真的性情，反倒对入朝任职有些不适应。他看不惯朝内暗流涌动的争权夺利，很快就因仗义执言和皇帝齟齬不断。

萧大亨还朝时，帝国东面的朝鲜正遭受日本侵略。而明朝的对日战略，很长时间都举棋不定。时任兵部尚书石星，一直主张对日本封贡，以求议和结束战争。好静的明神宗也不希望战事连绵、士卒死伤，所以在万历二十三年正月，派遣使者赴日本册封关白丰臣秀吉。

对明神宗的议和举动，御史曹学程深不以为然。他上疏抗议，指责遣使议和乃极其拙劣之策，认为“东事（朝鲜局面）之溃裂，元辅、权臣俱不得辞其责”。神宗见曹学程奏疏语含讥讽，认为他不仅阻挠议和，还影射自己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下令缉捕曹学程，交刑部严历定罪。

萧大亨知晓曹学程上疏出于公心，极力为他开脱。他随即上疏道：“御史曹学程为议东封一事，冒触天威，已经责问，乞免拟超释。”万历帝对萧大亨的保全大为光火，很快下令：“曹学程抗违诏旨，避难忘君，无忠义心，着遣逆臣失节罪，监候处决。”

萧大亨虽遭遇斥责，仍不改初衷，全力解救曹学程。万历二十六年，刑部审录重囚，准备交皇帝勾决。萧大亨为免曹学程遭不测，将自己的名字从死囚名单中划除。此事被万历帝察觉后，下诏夺萧大亨两月官俸。

萧大亨此后又为曹学程具疏七次。到了万历三十四年，曹学程终于获释归乡。时人认为，曹学程能幸免于难，缘于萧大亨的极力相争。

对于主战派的曹学程，萧大亨努力解救。对于主和派的石星，萧大亨也不计嫌隙，施以援手。

石星的议和之策，最终遭到了惨痛的失败。万历二十五年，朝鲜半岛鼙鼓动地来，丰臣秀吉再次集结大军攻朝。很快，日军连破数城，明军死伤惨重。神宗恼恨石星“误国”，将他革职下狱，命法司拟罪。他在给刑部的谕旨中，几乎咬牙切齿地说：“（日本）掠占属国，窥犯内地，皆前兵部尚书馆贼愚，欺君误国，以致今日。裁我将士，扰我武臣，好生可恶不忠！著锦衣卫拿去法司，从重拟罪来说。”愤恨的言词中，已满含杀气。

在对日问题上，萧大亨始终坚持主战，与石星长期政见不合。两人在朝堂上，常常各执己见，话不投机。如今万历帝让萧大亨办理石星案，正是希望他落井下石，置石星于死地。

令万历帝想不到的是，萧大亨不仅没有逞己之快，而且再度没有迎合自己，对石星从重议罪。萧大亨上奏认为：石星在明军入朝之初，主持兵部事务，收复失地甚多，功不可没，他的封



萧大亨铜像

贡之议，属于计策误国，并非有意敌敌。萧大亨与各法司会商后，决定否定神宗的“通敌死罪”，而以“酿患祸国”罪，将石星永戍边疆。神宗闻讯非常恼火，降旨切责萧大亨，甚至辱骂他“狗私朋比”。皇帝盛怒之下，革去萧大亨的一些头衔和世袭待遇，并执意将石星处死。但萧大亨等人继续竭力相争，石星最后得以病死狱中。时论感慨地称：“当西睡主战，东事主款，司马（石星）皆与公（大亨）抵牾。而公卒全司马，其秉公持平如是。”

石星死后，兵部事务由萧大亨兼摄。在“主战”的决策下，抗倭之役最终取得胜利。但由于在曹、石两狱上，坚持己见、深怀圣意，萧大亨为神宗所深深不喜。万历二十五年，故官三殿遭遇火灾。大臣们各循旧例上疏自陈失误，请求罢斥免官。众臣的奏疏都下发了，唯独萧大亨的奏疏迟迟不见踪影。有阁臣请求下发奏疏，神宗一直置若罔闻，可见君臣积怨之深。直至打败日本后，神宗心情舒畅，才慢慢恢复了对萧大亨的信任，冰冻的君臣关系渐渐融化。

朋党渐起，倦急纷争归故里

朝鲜之役中，萧大亨为提高决策效率，往往对御史们的意见置之不理。这虽然得到了作战将领的拥护，却深深伤害了言官群体。萧大亨细微的决策失误，被御史们迅速放大，妖魔化为“偏听则暗”的典型。所以战争刚刚结束，萧大亨就开始受到言官竞争的困扰。万历二十七年，兵部主事丁应泰上奏，弹劾前线总督邢玠先以巨款贿赂石星退兵，再向朝廷谎称战胜。他还诬陷萧大亨与邢玠是同乡而结为朋党，合谋欺罔皇上。

丁应泰的奏疏内容公布后，不仅令劫后余生的朝鲜君臣严重不安，也令出生入死的抗倭将士严重不满。萧大亨很快上疏澄清，并豁达地表示：“丁应泰参臣不足惜，国家之体大当惜；督抚之功不必叙，将士之劳苦当叙。”

萧大亨的辩白，一定程度上将言官与“前线将士”对立起来，虽然得到了皇帝的谅解，却激发了言官的愤慨。很快，多名阁臣先后参劾萧大亨，诬陷他结党卖国，培植私人势力，言辞非常激烈。

在言官的群起声讨中，萧大亨如履薄冰地办理着朝廷事务。到了万历三十四年，皇帝内閣臣举荐吏部尚书人选。当时廷臣数次推举，皆以萧大亨为首选。第二年，萧大亨出任吏部尚书的呼声更加高涨，“吏部缺尚书，三年屡推不点，外廷疑上欲临时点用大亨”。

但在这时，此前对萧大亨不满的御史们，又接连上疏弹劾他。这时的萧大亨已经年逾古稀，精力不及从前，面对无休止的党争倾轧，内心深感倦怠厌烦，数次上疏请求去职。但对于萧大亨的执意请辞，吏部多次出面挽留。而御史们又借此发难：“大亨以久干物议，再疏乞休，吏部职司澄汰，奈何满纸绸缪，以熨上听。”萧大亨“羈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”的感叹，由此更加强烈。

到了万历三十六年，经过几十次的上疏请辞，皇帝终于准许了萧大亨回乡的要求。对于这位守边重臣，万历帝虽然曾经与他冲突不断，此时却郑重地下旨褒奖他，赐予他“乘传归”的待遇。

平静的居乡生活三年后，80岁的萧大亨病故。明神宗以“已故兵部尚书萧大亨累著功业，予祭葬如例，仍加祭一坛”，并追赠他为太傅。

曾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，是萧大亨的同科进士，此时为他写下墓志铭。他念及时局维艰，朝廷痛失柱石，因而发出了内心的感慨和担忧：“今海内幸无警，而边事尚多隐忧，安得起公于九原，与之决大疑，定大计，此余所以重为公悲也！”

相关阅读

经过百余年的战争，明朝和蒙古部落终于意识到，和平共处、贸易往来才是互惠互利的有效手段。

一大批马市在边地开设，令仇恨的烟云消散，让富饶的景象再现。

马市：边疆和解的一针强心剂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萧大亨镇守边疆，多年无重大警情，其缘由除了他勤谨善谋外，也和明穆宗隆庆年间达成的“和议”息息相关。

隆庆议和是对明代北部边疆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。正是由于隆庆和议规定在宣府、大同地区开设马市，使得两族百姓有了贸易往来的渠道，为民族和解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

其实马市贸易，并非始于隆庆时期。根据《明史》记载，大同马市始于明英宗正统三年（公元1438年）。时任大同巡抚卢睿，请令军民平价交易驼马，但并不允许买卖兵器和钢铁。十年之后，御史沈固请求朝廷支取山西行都司的库银来购买蒙古良马，充实明军骑兵部

队。这是官方首次参与民间贸易。

随着官方的参与，蒙古部落贵族也不断请求封赏，导致明廷不堪重负。两族关系恶化后，蒙古部落在“土木之变”中俘虏了明英宗，马市贸易完全中断，边境重新陷入肃杀和仇视。

土木之变一百余年后的明世宗嘉靖三十年（公元1551年），因总兵仇鸾所请，朝廷诏于宣府、大同开设马市。但开市并未让鞑靼首领俺答汗停止抢掠，如果大同开市就抢掠宣府，如果宣府开市就抢掠大同。嘉靖帝极为懊悔和懊恼，很快又关闭了马市交易，维持时间仅有一年左右，可谓昙花一现。

明朝开设的两次马市，不仅维系时间很短，而且都归于失败，并未发挥靖边的功用。

而蒙古部落在和明朝的长期冲突中，也认

识到战争劫掠成本愈发高昂，不如与明朝和好互市。而明朝也发现，与北邻的对峙，消耗了国家过多的资源。如果两族能和好通市，对于化解积怨与矛盾，舒缓沿边紧张局势很有好处。

土木之变一百余年后的明世宗嘉靖三十年（公元1551年），因总兵仇鸾所请，朝廷诏于宣府、大同开设马市。但开市并未让鞑靼首领俺答汗停止抢掠，如果大同开市就抢掠宣府，如果宣府开市就抢掠大同。嘉靖帝极为懊悔和懊恼，很快又关闭了马市交易，维持时间仅有一年左右，可谓昙花一现。

明朝开设的两次马市，不仅维系时间很短，而且都归于失败，并未发挥靖边的功用。

在双方各取所需情况下，明朝册封俺答汗为

小王子又先后两次进犯大同，明军每每失利，损伤严重。明武宗后来私自跑出北京，来到边陲，就是想会一会这位令明代将领闻风丧胆的小王子。

嘉靖十三年，蒙古部落五万精骑入犯大同，明军坚守城池不敢出战，偷道被断绝，“中外大震”。嘉靖二十一年，俺答汗入侵大同，大掠太原并南下，京城被迫戒严，到七月才退走。此次他共掠夺十卫，三十八州县，杀人二十多万，抢牛、马、羊、猪二百万头，衣服、银钱无数，烧毁公私房屋八万户，践踏庄稼几十万顷。

隆庆和议封贡互市后，使得百余年来硝烟烽火基本平息下来，长城沿边生灵免遭涂炭。内阁大学士李春芳、高拱言道：“三陟晏然，边陲释戈而荷锄，关城息烽而安枕，此自古稀有之会。嘉靖中，虏屡求贡市，令促不知所策，于是黠虏愤愤，拥众大举，直抵京畿，二十余年无宁日。遂使边境之民，肝脑涂地，屯田荒芜，盐法阻坏，币藏倾竭，士马罢顿，是往岁失计之明验也。”

而相对安宁的环境，又使得北部沿边地区的农业、畜牧业、手工业等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。而兴旺的经济，不仅改善了百姓生活，也为马市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。

而在封贡互市后，明王朝借此时机，进一步加强边防建设。他们购置良马，修葺边塞，北部边疆人民生活日益安定。